

期刊·观察

五四百年 致敬青春

本报记者 郑文丰 文/图

回首百年前的五四运动,最不缺的就是一个“新”字。这场由新青年开启的历史大事件,形成了1919年前后长达数十年的新文学运动、新文化运动。五四新文学的主题是

新人类的诞生,以及新人类诞生之后必须面对的处境与必须承担的使命;五四新文化“旗手们”号召从文化的层面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,他们无一不寄希望于新青年,期望青年一代确立现代化的意识与信念,既克服自身的劣根性,又能促进整个国民性的改革,开启一个新的时代。

最新一期的《博览群书》杂志从王国维、陈寅恪两位大学者为切入点,回望百年五四。说是1927年

6月2日,民国大家王国维于颐和园鱼藻轩自沉昆明湖,留下十六字遗言: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;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。”作为王国维的生前至交,陈寅恪先生在纪念挽辞中阐明了王国维之死的文化意味:“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,为此文化所化之人,必感痛苦,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,则其所受之痛苦亦愈甚。”由此出发,中央党校(国家

行政学院)文史教研部副教授、中国史教研室副主任王学斌在专题文章中的落脚点是:“旧纲纪已破,新伦理未立,这即是王国维、陈寅恪等学术巨擘所面临的中国文化、社会抑或政治之实相。此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欲解决之难题。”他认为,为破解这一难题,五四超越了政治、文化的藩篱,走向了社会并改变了社会,五四作家群体的涌现和平民教育潮流的兴起。

“从中国政治发展角度看,五四运动的爆发与此前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,是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惘、精神探索的继续和发展。”

历史学家马勇也从五四运动试图解决的难题入手,在《东方历史评论》杂志发表《今天我们如何看五四?》的署名文章。他说,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之一,它标志着中国人,至少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,是1840年以来中国青年知识群体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政治,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,即中国的政治已不再限于职业政治家范围,而扩大到了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层面;就历史大势而言,五四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,也造就了一批新人。除了这篇文章,《东方历史评论》杂志推出“五四百年专辑”,从各个角度全面剖析了百年五四的历史价值。

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先生以五四为背景,分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。他的《五四·鲁迅·孔子》一文发表在

最新的《天涯》杂志上。他认为,鲁迅的思想有许多是与孔子的文化遗产碰撞、剥离中出现的。鲁迅非儒的背后,有其精神选择的策略,他以彻底叛逆,抵达了一片精神高地。而那高地,也未尝不是孔老夫子渴念的所在,只是他们的路径多有不同。鲁迅与孔子都承认人的有限性,不认为自己是先天知之,在一个价值失范的年代,他们都选择了与流行文化不同的路径。其思维方式、逻辑过程、人格特征,有一种历史的连贯性。

五四转眼百年,但其诞生的“新”,迄今看来仍不过时。



文学期刊

译与写之间的摆渡人

《花城》2019年第3期,双月刊

评论家何平先生主持的“花城关注”栏目,在开办两年多的时间里,实质上充当着《花城》这本文学杂志的“话筒”角色,对诸多文学现象、文学话题进行着当下性的探讨和发声。在读者印象中,这一栏目最大的特点是挖掘作家“非职业写作者身份”或者“多身份”的一面,也就是说,写作不一定是作者唯一的身份,作者可能还是导演、人类学者、翻译家等。

何平先生注意到,写作者的“专业化”,在当下青年写作中得到很大的改观,哪怕写作对他们而言是一份“主业”,他们也都有编辑、编剧,甚至和写作完全无关的“副业”,或者有的人,写作直接就是他们的“副业”。

何平先生试图借助“花城关注”栏目,进一步打破写作“专业化”的局面,为全民写作呼与鼓。最新一期栏目关注的则是于是、默音、黄昱宁三位译者创作的小说。其中,英语译者黄昱宁从事小说创作的时间最短,日语默音译与写几乎同时展开,而另一个英语译者于是,则是先写而后译,她们是不同的。

栏目认为,译者的小说,是写作者在译与写之间的旅行。且从五四新文学至今一百年,“译”从一开始就是“写”的重要建构力量,没有林纾等及其之后文学的“译”,新文学的“写”几乎很难成立,而且至今仍然是,就像黄昱



宁所说:“我们无法忽视翻译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中起到的作用,通过翻译,我们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建构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框架,但与此同时,属于中国本土的小说文本积累似乎还没有与之匹配的厚度。”

何平认为,不只是在新旧文学博弈的时刻,在中国新文学每一次崛起的关键时刻,往往是“译”提供了最有力的庇护和支援,甚至在新文学的草创期,一些写作者以“译”代“写”贩卖搬运而成为自己的个人创作。反了旧文学传统,新文学是从“无”开始的,而彼时,文学的职业译者还没有像今天如此平常多见,写作者因有域外游学经历,身体力行译写合体也是自然。

中国新文学的文本细读

《天涯》2019年第3期,双月刊

最新一期的《天涯》杂志,我们可以读到一位学者和一位作家的文本精读文章。学者郜元宝对鲁迅《补天》和郭沫若《凤凰涅槃》二文进行对读,认为《凤凰涅槃》初稿时间在《补天》之前,在主题上却是《补天》的续写,这两篇文章,共同构建了中国新文学日出一般磅礴壮丽的开篇。作家李浩的《张爱玲<封锁>漫谈》,则以作家的同情心、同理力,挖掘出了张爱玲小说之内的细节、小说之外的情趣。

郜元宝认为,五四新文学的主题是新人类的诞生,以及新人类诞生之后必须面对的处境与必须承担的使命。而能表现这一主题和使命的,是鲁迅先生的小说《补天》和郭沫若的诗歌《凤凰涅槃》。《补天》是鲁迅对女娲抁土造人、炼石补天的神话传说进行的一次极富个性的改写,小说写道:女娲造人并无什么目的,只是精力弥漫,不做什么就“无聊”,“觉得有什么不足,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”,于是就抱着游戏的心态,随手造出了人类。原来女娲造人并无什么特殊意图,她对被造的人类也并非什么明确指令。女娲给予被造者充分的自由,让她被造者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,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。但与此同时,人类作为被造者,从诞生之日开始,就必须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,独自探索人生的方向,而不能指望创造者来帮助自己。郭沫若先生的《凤凰涅槃》,则借凤凰五百年集香木自焚并从死里复活的传说来讴歌新生命、新文明、新宇宙的重生与再造,同时也看到凤凰之外其他“群鸟”种种的丑态。作者认为,鲁迅与郭沫若的文



学风迥然有别,但心是相通的。他们都要凭借自己的力量,重新创造不完美的世界和不完美的人自身。而如此肯定人的价值,相信人的力量,高举人的旗帜,正是“五四”时代的最强音。

作家李浩说张爱玲是有着“独特面目”,极具“个人标识”的作家,她甚至创造了一种写作的体式:张爱玲式写作,或简称“张体”。他认为,在张爱玲的短篇《封锁》中,她的那种所谓“张体”的个人标识显得足够充分,具体有三大特点:一是用词新艳,善用奇妙的有特点的比喻,有一种重彩的“艳妆”之美,其包裹的却往往是“苍凉手势”;二是有一种强烈的“审视感”,她的书写给人的感觉是总有一个观察者在不远处“冷冷地窥见”,她不介入也无太强意愿介入,却暗自怀有不屑、嘲笑、憎恶和“哀矜”;三是平行于世相,处处带有对世情世相物物的“入迷”,却又有某种的疏离。这使得张爱玲作品的美与妙都充满着趣味性。

读书期刊

正说儒道两家的差异

《书城》2019年5月号,月刊

作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三个精神传统,儒、道、佛之间的联系与差异,每个国人都能或多或少地说上几句。流传得较广的则是南怀瑾先生的一句话:“儒家是粮食店,佛家是百货店,道家是药店。”此言妙则妙矣,但失之于过于感性。最新一期的《书城》杂志发表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《从老庄道家谈中国文化》长文,着重论述了道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,特别是与儒家的地位相比是怎么样的这两个问题。

作者认为,道家与儒家之间的关系,过去的学界有两种说法,一是“儒道互补”,即儒家和道家两者之间是互相相应和、互相对应的;二是陈鼓应先生提出“道家主干”说,认为道家比儒家更重要,因为道家讲的一些最根本的道理,而儒家讲的都是些太具体的事情,跟道家不能比。对此,陈教授个人的观点是,对中国社会来讲,儒家的地位比道家更重要。因为儒家跟中国整个历史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,儒家是一种在中国文化、社会、历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说;但如果走出中国文化,从整个世界、整个人类文化的范围来看的话,道家的影响比儒家要大。在所有被翻译成外语的中国典籍中,老子《道德经》的版本数量恐怕是最多的,比《论语》多,道家的抽象思辨对整个人类的哲学思想的贡献可能也更大一些。

那道家与儒家之间到底有何差别?作者从“天地人”三才的框架予



以了分析,认为儒家更注重现实,更注重“人”的重要性,是人类中心论,对人有一种高度的尊重。而道家是更开阔地看待这个世界,它把人看成万物之一,万物平等,这是其一。其二,在人间社会当中,儒家更多关注人际关系,关注一个社会的组成、社会良性秩序和它的运作。而对道家来讲,更多关注的是个体在社会当中的地位和保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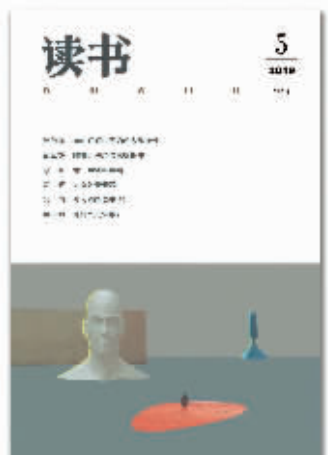
如何看待道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?作者认为老庄道家学说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:儒家特别强调平衡折中,道家实际上是特别注重“变”,强调要适应变化,因势利导,让其自己成长,避免揠苗助长,最终水到渠成;在美学领域,儒家强调社会性,强调政治、教化,道家讲求虚实结合。道家思想无疑对于中国人的审美理想的影响更大。

为郑玄“画像”

《读书》2019年5月号,月刊

学者吴飞认为,传统中国的学问有两个公认的高峰,一个是东汉的郑玄,一个是南宋的朱熹。前者被尊称为郑君,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;后者被尊称为朱子,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,奠定了元、明、清的思想范式与意识形态。两位大师各领风骚六七百年,相继构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主干。对于今人而言,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,人们心目中大多有个朱子的形象;但对于郑君,不仅一般人茫然,甚至专家也难以给出稍微系统一点点的描述。郑玄思想面目很不清晰,似乎距离现代人太遥远了。幸而,他发现,青年学者华喆的《礼是郑学》一书,则围绕郑玄来展开,在其思想勾勒,尤其是文明构想、汉魏之间经学与制度的演进方面,阐述尤多。为此,吴飞对华喆的相关工作进行提炼与评述,形成的文字发表在最新一期的《读书》杂志上。

吴飞认为,郑玄的这一模糊形象,其实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,由于郑玄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经注当中,而郑注又惜墨如金,如果在不同经文的郑注之间反复比对分析,是很难理解他到底在想些什么的,因而在其身后不久,要真正系统地把握郑学,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;宋代之后,郑学为朱学取代,其形象自然就日渐淹没。清人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摸索,才逐渐转向郑学,但也很难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郑学。因而,重新认识郑学的问题,不仅持续了千年之久,而且本就极为艰深。



但对于想要全面了解中国学术传统的现代人而言,郑玄却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人物。在某种意义上,了解郑君比了解朱子还重要一些。经学,是在郑玄手里才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;而且,成为以后千年的基本政治架构的隋唐礼法架构,更是大大依赖于郑学。

吴飞评价说,在文明史演进的动态过程中考察作为经学体系的郑学,是《礼是郑学》一书最重要的特色。因而所有这些围绕郑学体系的诠释展开,强调“礼学是郑学的核心”。通过这部书,我们感知到郑玄绝不是一个只知锱铢之学的书呆子,而是有着非常宏大的文明构想。汉魏之间经学与制度的演进,正是这一构想不断修正和落地而形成的。由中唐赵匡等人的新经学,到宋代经学体系的再造,以及清人向郑学的回归,郑学体系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底色。

博物期刊

海军基地是星辰大海的起点

《博物》2019年5月号,月刊

时值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,最新一期的《博物》杂志推出了“海军基地”特别策划。杂志遍观世界四大洋每一座声名赫赫的海军基地,背后都充满着地理、历史和国家战略的积淀。

首先,海军基地很重要。世上不管多么强大、多么先进的军舰,都必须经常回到自己的家——海军基地进行“回血”,之后才能再次出海劈波斩浪。每艘军舰在几十年的服役期里,有一半时间都是呆在基地里保养维护的。所以,只有建造好海军基地这个“军舰之家”,才有海军舰队的“星辰大海”。如此重要和复杂的地方,甚至都没几个。就连一些公认的“天然良港”,都当不了海军基地。

其次,依托内陆工业区的海军基地,可以成为坚实的后勤中心。而在茫茫大海上,一些战略位置重要的岛屿,或许缺少搭建基地的条件,却一样可以成为帮助海军争夺制海权、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节点。在本期《博物》“特别策划”中还推出“不沉的航空母舰”一文,为



读者盘点了世界上的一些主要的战略岛屿。

除此宏大主题外,杂志还来了一波“回忆杀”。原来,前阵子有一部国产动画在网上大获好评,叫做《白蛇:缘起》;最近电视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也在热播,唤起了许多人对经典传说“白蛇传”的回忆。《博物》找到了一位生态摄影师,介绍了他与白蛇、青蛇的不解之缘:怀揣着童年的梦想,他十年如一日,在野外寻找真实存在的“白娘子”和“小青”,结果真被他找着了!很是吸引读者往下看。

百年五四的芳华与时尚

《中华遗产》2019年5月号,月刊

流传下来的许多老照片,在服饰上常常给人穿得五花八门的印象,有马褂、西装、军装、长袍。这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,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着装,一时间新、旧、土、洋诸多服饰风格交相辉映。最新一期的《中华遗产》杂志对当时的服饰与时尚作了一次大盘点。

那时,男人们剪掉了辫子,而少女们头上却兴起了辫子,或长或短,或单或双,如两只蝴蝶般可以前后飞舞的发辫,成为不可超越的时尚经典款式。美丽永远是从“头”开始的,那些年间,剪短额发的刘海发型,终于突破了年龄和身份,成为时尚的标志:“烫发”更是成了女人走向时尚之路的“必修课”。时人称之为女性的“头发革命”。

旗袍也是另一种时尚。作家曹聚仁先生发现,“一部旗袍史,离不开长了短,短了长,长了又短。”此言不虚。《中华遗产》杂志在盘点中发现,1932年,女性旗袍下摆又开始变长,及至脚踝,需穿高跟鞋才不至于拖地。而到了1935年后,旗袍的开衩趋小,但仍长度及地,可盖住双脚。不论旗袍长短,都讲究量身定制。但想要量体裁制一身旗袍,并不是容易的事。传统的“十字形平面结构”看起来十分简单,但实际操作起来却费时费力。制作旗袍时需



要专门的一套工具,有一些大家可能很熟悉,比较特别的是叫“粉线袋”,它的用途和木工使用的“墨斗”有些类似,即画直线。粉线袋内是碾碎的划粉,使用时,将棉线在袋中左右拉动,沾上粉末,再将棉线拉直,轻轻一弹即可。较之划粉,它的优点是完全不会拉扯布料。

除了旗袍外,素袄和黑裙组合的学生装竟然也能引领时尚风潮。素袄由传统袄裙变化而来,基本形制是上衣下裙。但相比传统袄裙的繁花刺绣,拼接镶滚,其整体十分朴素。上身素袄,下身不施纹饰的黑裙,质朴无华,但正是这身搭配,像极了《那些年,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儿》,于1920年代风靡一时。